

考古学参考资料

1

K85/2

考古学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1

文物出版社

1978年·北京

考古学参考资料

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内部发行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号

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统一书号：11068·707

定价：0.90 元

目 录

编辑说明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美国)张光直(3)

东亚古代文化的起源……………(苏联)刘克甫(22)

西周文化的起源和宗周……………(日本)伊藤道治(43)

蒙古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史问题

……………(苏联)Э. А. 诺芙哥罗多娃(54)

朝鲜半岛的考古学……………(日本)三上次男(110)

日本考古学的动向与课题……………(日本)斋藤忠(126)

发自地下的声音：四千年的文化……………(越南)杜文宁(147)

东南亚——古代的文化中心……………(苏联)Я. В. 切斯诺夫(153)

* 简讯 * 我出土文物赴港展览的盛况 ……………(166)

编辑说明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大考古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认真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了适应我国考古战线大好形势的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发展，我们从去年10月开始，在各方面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试编内部刊物《考古学参考资料》，先后出版了三辑，内部赠送有关领导机关和兄弟专业单位。现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将本刊改为内部发行的不定期刊物，每期刊约十万字。同时，我们正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转为定期刊物。

本刊拟采取全译、摘译和综述等方式，并选载我国台湾省等地人士和外籍华人的部分中文原作，反映下列几个方面的情況：

一、国外考古界的动态，特别是对我国考古学的观点与反应；

二、帝修反利用考古学进行反华的反面材料；

三、我国台湾省以及港澳等地的考古发现；

四、世界各地考古学的重大发现，特别是邻境各国各地的考古资料；

五、外国考古学上采用的自然科学新技术与新方法；

六、其他有参考价值和值得注意的考古文章、资料和动态。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而又相当繁重的工作，无论人力上还是水平上，我们都难以胜任。我们竭诚希望兄弟单位和广大读者继续给予大力支持与协助，包括投寄译作、提供情报，批评缺点错误、提出改进意见。来稿及来函请寄我所图书资料室翻译组。

本刊只供内部参考，请勿外传。读者如需引用，务请迳从原文。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

张光直

(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

上篇 中国的早期农人

考古学家们经常谈论文明的起源，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谈论起源的理由也随之改变。一直到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儒家的学者们为了解释现存的世界秩序并为它辩解，总是从神话和传说材料中寻求中国文明的起源。在最近几十年里——特别是1920年田野考古学这门科学传入中国以来——西方的学者们曾一再试图证明中国文明的最重要因素来源于所谓西亚原型，有时甚至把整个中国文明贬低为仅仅处于派生地位。但是，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发展，他们对自己的起源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很自然地把这个问题同他们对自己的族属和民族自信心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加上纯粹的好奇心本身，仍然是研究过去的正当动机，而今天，考古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中国文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出现在什么地方？它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跨过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对文明的诞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门槛？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化、青铜时代的出现、国家的起源——把这些基本阶段勾划出来，当然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的

• 译注：张光直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确，工作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但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要理解象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的整个发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必须处理大量互相关连的因素。他们也必须把中国文化的特殊演变置于世界历史的长河之中，以便使普遍的形式得到证实和丰富。

现在，还有一个更加紧迫的原因促使人们去重新评价中国起源的整个问题。自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考古学在中国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新资料的涌现使很多不久前为人们所接受的、而且似乎是革命的观念，很快就过时了。在过去的二十七年里，政治上的稳定、经济建设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利气氛，这一切促成了中国考古工作史无前例的繁荣，现在可以利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为切实的资料。特别重要的是从1972年开始发表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后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一些地区新发现的史前时期和商代（中国第一个王朝，公元前1766—1122年）的大量重要遗址，而在过去，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在早期中国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些发现为我们探索中国的起源展现了新的远景；而在早先，这种远景是无法想像的。因此，过去的所有假设都必须重新加以考虑。

下面对古代中国的现有认识作一评介。虽然中国早期的形成期仍然不太清楚，但是关于它的发展情况，还是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勾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本文是两篇文章的上篇，探讨古代中国的三个主要地区，即东南地区、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早期农业。拟在〔原刊〕五月号发表的下篇，将着重讨论商文明，这个文明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高度发达的强大国

家。

大约在一万到一万二千年前，冰河时期结束时，全中国许多地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已经具有足够的技能来系统地利用野生植物作为食物。毫无疑问，在这以前人们曾经到处觅食，从事采集和狩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本地区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但只是到了冰河时期结束时，他们才有了专门的工具和文化上的改观，使他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法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源。虽然发生这次农业革命的确切年代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推测产生这一革命所必需的条件：一个已充分改观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可供栽培的野生植物；一个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从而能够有效地利用其资源的文化；最后，还要有一个触发作用去促进或迫使人们在某一特定地区内更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各种资源。这种触发作用有可能是人口的明显增长，它或许是由于冰河的退却和由此产生的增产而引起的。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由于鱼类和禽兽是比较有限的资源，人们为了取得更多的食物，很自然地会转向植物。在适当的时候，这样的植物有些就会被人们栽培并大量种植。然而，这种向完全成熟的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确定一个确实发生过这种变化的“核心地区”，需要环境学家、植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很多其他专家的共同合作。不幸，这种合作几乎尚未开始。因此，关于世界这一部分的人们跨越这个门槛的确切步子，学者们仍然所知甚微。但是，正如考古学的记录所示，这里有过这样的步子是完全用不着争辩的。在整个中国，北方和南方，特别是靠

近以后的文化发展的中心，已经发现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已经进步和改观的文化的确定。此外，很多植然学家深信古代中国是早期植物的发源地，一些重要的作物就是从这些早期植物发展而来的。已故的俄国植物学家瓦维洛夫 (N. I. Vavilov) 说过：“中国以其作物品种之丰富，以其可栽培的植物种属之广泛，而突出于其他的植物种类发源地之中。”（《作物的起源、变化、免疫和繁殖》，《Chronica Botanica》，1949—50，第26页）最后，已知的早期中国农人在全国很快发展兴旺起来，他们主要依靠这些本地的食用作物为生，并且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文化类型。

让我们首先考察中国的南方地区。最近几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它盛行于福建、台湾和广东的丘陵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用粗陶土做的陶器，器表的纹饰往往是缠着绳子的木棒的印纹，以及（或者是）带状的划纹或篦纹。典型的罐是圜底的，有的在器底加一个圈足。和这种陶器共出的石器有粗糙的打制砍砸器和磨制精致的石斧、箭头和带有沟槽的树皮布打棒。这种文化在台湾的考古学上被称为大坌坑文化；它和印度支那的和平文化有明显的联系，但并不完全一样。对台湾和福建的这种文化遗址用放射性碳素所测定的年代最晚在公元前五千年。日本列岛和泰国的绳纹陶所测出的年代甚至更早。

已故的地理学家卡尔·索尔 (Carl O. Sauer) 很早就推测东南亚的古代沿海居民属于最早栽培食用植物的人之列。他认为，这些人本来是渔猎人，他们不仅食用这个地区丰富的野生植物，而且还用它们制作工具、纤维和毒药。在泰国北部的仙

人洞遗址中，与绳纹陶同期甚至更早的地层大量出土野生植物种籽，这些植物显然是用作食物、调味品和香料的。这样，东南亚和中国南方的不同民族很可能是同时栽培大批食用植物的，这些作物大概包括芋、薯蕷和多种水果等东南亚古老植物。

尽管我们对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遗址了解得极少，而且很可能今后的工作还会大大地改变现在的见解，我们仍可以发表下述看法：从一万年以前到大约公元前3200年或再晚一点，一群使用绳纹陶的块茎植物种植者居住在这个地区，往北或许远达长江中游。此后，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显示出和与之同期的北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十分相似的特征。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文化的人们种植稻米和饲养鸭、鹅之类的家禽。他们也从事纺织。他们的石器和陶器在很大程度上是“龙山类型的”，即同别处发现的龙山文化器物相似（我们即将讨论这些文化）。有理由设想屈家岭文化以及其亲属文化是在龙山类型的影响下在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后来中国南方的一些商周文化赖以形成的基础。

和块茎种植者居住的中国南方相反，中国北方地区是粟稷种植者的故乡。这个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和河北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几种不同的粟稷（主要是粟 *Setaria italica* 和黍 *Panicum miliaceum*）是整个史前期和商周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谷物。只是随着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建立，这个地区的人们才开始大量食用小麦。这些人也饲养猪、狗以供食用，养蚕种麻以为织物，建筑房屋起先用篱笆并涂泥，稍晚则用夯土。另外，他们还使用一套数目字和其它符记，这些

符号最终溶入于历史时期的文字系统。最后，他们还制造显然具有北方风格的陶器和石器。

考古学的发现表明中国北方的早期农业文化经历了四个连续的发展阶段：（1）绳纹陶文化，（2）仰韶文化，（3）庙底沟二期文化，（4）龙山文化。关于绳纹陶文化，至今还了解得极少。在华北腹地的几个遗址中曾发现过绳纹陶文化，其陶器器形和纹饰预示了仰韶的型式。学者们不能断定它有多早，但可能和中国南方发现的绳纹陶有联系。在进一步了解这两种文化之前，它们之间可能的联系将仍然是不清楚的。

与此相反，仰韶文化却有了充分得多的记录；在陕西、甘肃东部、山西、河南、河北和邻近的地区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这种文化的遗址。它们的年代从公元前5000年或更早一直到大约公元前3200年。目前，最著名的仰韶遗址是西安半坡村附近的村落。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仰韶村落；在它的极盛时期，有二百多座房屋和五六百口人。房屋集中在大约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房子作长方形或圆形，用木料和篱笆涂泥筑成。这个居住区周围有一条宽度和深度均约为6米的壕沟。壕沟外面，往北是村落墓地，往东是陶窑群。

村落的居民们以捕鱼、耕作和狩猎为生。毫无疑问，他们垦殖遗址周围的河谷平原，粟是他们的主要作物，虽然也发现了中国芥菜的菜籽和几种坚果——榛子、朴树子、栗子和松子——的遗存。在他们的园地里想必生长着各种蔬菜和果树。有证据表明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他们清除小片的树林，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植谷物，直到土地丧失其肥力（通常是几年），再转移到另一片开垦地上去。他们使用石制的斧、锄

和镰刀。半坡遗址的垃圾堆积中发现了兽骨，包括家禽（猪、狗）和野兽遗骨；他们的工具中包括适用于打猎和捕鱼的装备。

但是，最能代表仰韶文化的却是陶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胎色以红色和浅黄色为主，器类主要有两种——用于饮食的细泥陶器和用于炊煮、贮藏的粗陶器。前者往往磨光并绘有各种黑色的纹饰：鱼、兽、人形和几何花纹。后者通常饰有绳纹、波浪纹或指甲纹、刺剔纹。器底多为平底或略呈圜底。有的带圈足或三足，这些三足器被称为鼎。大多数是泥条盘筑，用手抹光，施以纹饰，然后放在露天的或地下的窑里烧成。有的陶片上刻有符号，据考释，其中一些是数目字，另外一些则是文字，同几千年以后的商代文字相似。

华北地区的下一个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现在被看作是介于仰韶和较晚的龙山文化之间的短暂过渡时期。它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200—2500年。它的陶器明显地表现出过渡性特征，红陶和彩陶仍然很多，但很多器皿却是灰色或近乎黑色的。三足器和圈足器的数量增加了。这些变化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和各类器皿的用途变化。这些改变在随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大体上说从公元前2500—1850年）达到了顶点。龙山的陶器和仰韶陶器大不相同，灰色和黑色这时已成为主要颜色，与原先不同的器形日趋流行。器物表面各种不同的刻划纹和印纹（篮纹、绳纹和席纹）这时要比彩绘更受欢迎。圈足碗和袋足或实足的三足器更为盛行。

从仰韶到龙山，陶器经历了如此明显、彻底的变化，这就需要作一点解释。考古学家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陶

器代表了不同起源的同时代人。现在，人们已不再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了，而是把这两种传统看作是同一个文化系统的两个连续发展时期。另外，随着龙山时期灰陶和黑陶的增加，绘彩的家用陶器减少了。这种减少或许可以用下面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同时用两种）来解释：其一，制陶已不再是一种家庭工艺；其二，其它的材料——例如木料或篮筐——被更多地用于制作家庭用器皿。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暗示，到了龙山时期手工业的专门化有了明显的增进。这一点至少部分地被下列事实所证实：普遍出有大量木工工具——凿、斧、镑；发现了使用陶轮的证据；出现了胎壁很薄的精致黑陶，这种陶器只能是专业制陶者的产品。

这些薄胎黑陶器的质地特别精致，表明它们是仪礼上使用的。这一点和其它各种证据都表明大约在这个时候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提出仰韶的妇女占有最高的社会地位，而在龙山时期男子成了社会的领袖。一些值得注意的考古学证据也给这一主张提供了根据。不过还有一些别的社会变化其迹象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有一些龙山遗址范围很大，而且看来要比仰韶遗址居住得更久。此外，有一些遗址还有泥土垒筑的防御工事。看来，这些遗址如果不是遭受袭击而被捣毁，也曾是袭击的目标。龙山遗址比仰韶遗址出土了更多的石制武器。也有可能，在龙山末期已经出现了金属加工，虽然这一点还不能肯定。无论如何，这些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比仰韶时期要复杂得多的文化，不但手工业更为专门化，而且人们对社会的等级也更加注意。精致黑陶之可能具有礼仪性质，表明这种社会等级的划分具有神权政治的意味。如果说仰韶文化的村

落看来是自给和自治的，那么龙山文化的村落就一定形成了或者开始形成交换网和部落联盟。

最后，我们谈谈史前中国的东部地区即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下游的平坦、低窪的冲积平原；这个地区从渤海湾沿着东海岸延伸到东海。这个地区包括现在的辽宁南部、河北东部、山东、江苏、浙江及安徽一部份。这个区域居住着种稻的农人，它可能是古代三个定居区域中最后有人定居的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内没有发现过像绳纹陶那样的早期陶器。也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地质学上称为“高温”（*hyp-sithermal*）或“气候最适宜的”（*climatic optimum*）温暖潮湿时期（距今约8000至4000年间），这个广阔的平原地区可能是遍地沼泽，有些地方甚至被湖泊所淹没。因此，当人们在西面和南面都已开始使用早期绳纹陶的时候，这里的整个地区还可能不大适宜居住。

根据放射性碳素的测定，东部沿海地区已知的最早居民的年代为公元前3835±105年，经树轮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4580—4410年。这些居民的出现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或者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变化，这个地区的一部份乾涸了；或者是这些早期农人这时有适应非常潮湿的环境的技术能力。他们可能引进甚至发现了新的栽培植物。如果他们起源于别的地方，那么他们可能是从中国北方地区沿黄河，然后沿淮河，或者是从南方沿海岸或长江而进入这个地区的。由于这些人的器物 and 仰韶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看来更有可能来自北方。另一方面，从他们显然以稻米为食看来，却也有可能是来自南方，因为中国南方可能是首先栽培稻米的区域之一。当然，有可能个别人与主要

来源相对] 是从南方或北方来的。

这些早期农人的文化，一般称为青莲岗文化，其延续年代为公元前4500—2500/2000年。这种文化的遗址从山东到浙江北部都有发现，而且可以再分为几期。大约从公元前2500—2000年以后，整个地区成为龙山文化的范围。在青莲岗文化和龙山文化发展序列中表现出来的变化包括很多不同的方面，但特别明显的变化还是在陶器方面。中国东部最早遗存的特点是同时有细、粗两种红陶。彩陶同样流行于较早的时期，晚期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制作和使用灰陶和黑陶，其中有些是迄今所知的古代中国最精致的标本。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序列，总的来说和中国北方的发展相似，这样的推测应是合理的。

不管人们对青莲岗文化的起源有什么看法，它和华北的仰韶文化之间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青莲岗陶器的特点是三足器和圈足碗，很多是高圈足，足上有各种形状的镂孔。纹饰中没有那么多绳纹和篮纹一类的印纹，彩绘母题有特殊的型式。在石器中，长条的镰刀和扁平的穿孔石斧比较突出，具有典型性。还有大量的玉石饰物和器物。

当然，这个沿海文化依靠它自己的特殊自然资源而生存。这里发现了栽培稻米 (*Oryza sativa*) 的遗存，其年代在公元前第五千年，这是各地发现的这种谷物中最早的、证据确凿的稻米。在发现的兽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水牛骨。这里人的房屋常常建在台地上、木椿上或人工堆成的土丘上。竹、木建筑结构和手工艺得以充分体现。

以这样的农业为基础，中国在强盛的商代时期发展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到了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至少在三个地区

——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
社会分化水平，从而为进入下一个主要发展阶段准备了条件。
关于进入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将在《考古学》1977年5月号
发表的本文下篇中加以讨论。龙山文化的所有三个分支都是以
各不相同的方式跨入文明的门槛的，此中河南龙山文化显然居
于领先地位。从它发展出来的商文明不仅成为高度发达的社会，
而且是当时中国最强盛的国家。这是怎么发生的？关于这个重
要问题，本文续篇再作讨论。

下篇 商文明

中国从原始的农业实践向多样化的社会结构的逐渐演变大
约在公元前2000年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形成时期。这时候，新
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至少在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三个地区
都已经发展得足够多样化，为过渡到一个进步的文明时期作好
了准备。所有这三个地区的龙山文化大概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
跨过了这个门槛，但是，河南龙山文化显然占了领先地位。从
这个文化发展出来的商文明不仅成为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而
且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政治“王国”。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探讨这个问题可以观察河南北部的安
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所在地的城市——
开始。传统的年代学把商朝的整个时期订在公元前1766—1122
年之间，而现在很多学者则把它的末年推后到公元前第十一世
纪。安阳的商代考古遗存，直到二十世纪初，当学者们追踪一
些新发现的带字卜骨残片来源于现代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附近